

薛祥生 孔繁信 选注

張養浩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72

I214.72
6
3

张养浩作品选

薛祥生 孔繁信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462265

书名题字：王遐举
封面设计：徐中益

张养浩作品选

Zhāngyǎnghào Zuòpǐn Xuǎ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5}{16}$ 插页 3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70

书号 10019·4198

定价 1.70 元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一

元 張養浩 撰

經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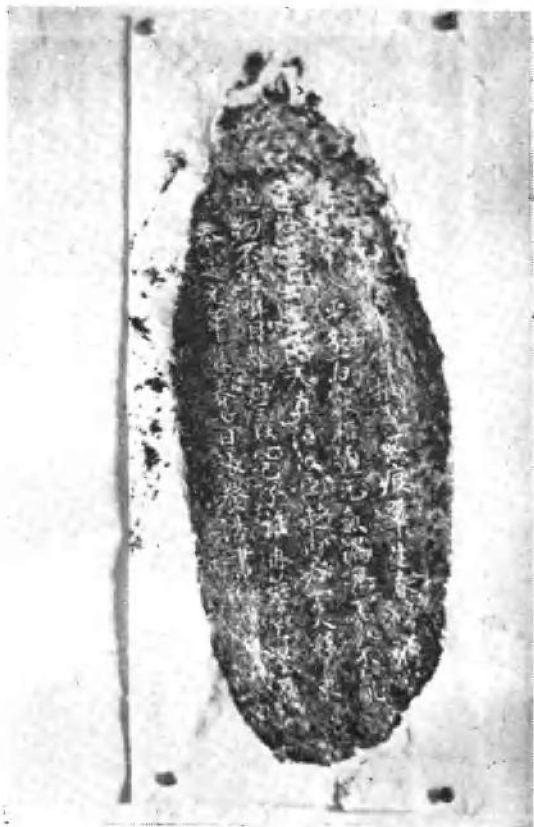
進表

奉旨覽讀至輒代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奏一詞具奏朕深然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

見蓋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為慮也深慮之深故其

四库全书本张养浩《归田类稿》



张养浩手书《江城子》刻石

手迹原文：“何年仙斧断云根？玉无痕，翠生春。磅礴空庭，太华入平分。百窍暗通元气漏，无一窍，不氤氲。想当邱壑闷天真，过波臣，走山君。一笑移来，造物不吾嗔。目击烟霞心已了，谁再梦，上星辰。元泰定元年暮春七日张养浩书。”

刻石现存山东桓台王渔洋故居，据说是王渔洋从济南运去的。

前 言

张养浩是元代著名的豪放派散曲家，研究元代散曲者，无不重视他对散曲方面的成就；他的诗文创制，造诣很高，也是元代文坛上的大家；他关心民瘼，留心时弊，所著政论和《三事忠告》等，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风俗的可贵史料。张养浩对元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又自称齐东野人，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他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宋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卒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一生经历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和文宗诸朝。世祖至元和成宗大德年间，是元朝国家空前统一，农业生产有所恢复，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城市逐渐兴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时期，史称元代盛世。武宗以后，虽出现过仁宗延祐间时代承平，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总的说

来，自仁宗以后，朝政日趋腐败，宫廷斗争愈演愈烈，对农民剥削不断加剧，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元王朝统治步步走向衰落。张养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张养浩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曾为武略将军，章丘燕镇酒监。到他的祖父张山，家道中衰，沦为平民。其父张郁，十六岁就承担起全部家务，靠经商维持全家生计。艰难困窘的家境，激发了张养浩好学上进的精神。他幼习儒业，笃学不辍，初步形成了他的“民本”、“仁爱”、“忠君”、“济民”思想，为他以后三十多年清廉为官的品格奠定了基础。又由于他工于为文，“早负文名”，十九岁这年秋登济南名胜白云楼，写下了才气横溢、文情并茂的《白云楼赋》，受到按察使焦遂的赏识，“其业未竟”，被荐为东平学正。

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十三岁的张养浩赴京求仕。经中书右丞陈英引见，他晋謁了平政事不忽木。不忽木大“奇其才”，先后将其荐为礼部令史、御史台掾史，后又改荐为中书省掾属。在这前后十余年中，他目睹了“当国者遇下如束湿，诸掾属动辄罹刑辱”(《济南刘氏先茔碑铭》)的官场情况，自己又沉于下僚，在京师一直过着清贫、劳苦、屈辱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消极，而是以极大的毅力经历着仕途的艰苦磨练，期待着“致君泽民”的机会到来。大德九年(1305)，张养浩循例选授为堂邑县尹。堂邑虽是个中等县份，“然户羨

事殷，常为他县剧”(《警宵楼记》)；加之前尹荒于政务，水灾连年，暴徒猖獗，社会秩序紊乱，百姓困苦不堪。张养浩感到“一县安危任不轻”(《初拜堂邑县尹》)，惟恐有负于民；且又认为“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三事忠告》)，救民水火，事关重大。及到任，首毁淫祠，严惩暴徒，改革官府征购制度，防止狡吏从中渔利，巡察灾情，率民生产救荒，尽力解救百姓疾苦。“三年之间，田者赢，工贩者足，强者不得病夫弱者”，一县大治。这三年间，他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深知百姓疾苦同吏治关系的重大，又借鉴历史经验，参照自己从政实践，写成了《牧民忠告》一书，给为尹者提出了“省己”、“戒贪”、“勉学”、“劝农”、“均赋”，“以礼下人”，视“民病如己病”等要求，成为当世甚至后代为尹的准则。由于德政于民，他去官十年后，堂邑犹为立碑颂德。

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去世，武宗海山即位。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因拥立海山有功，被立为皇太子，张养浩被任为太子文学。他的《经筵余旨》(包括《君德》、《君道》、《君体》、《君威》、《君治》五篇)便写于这一时期。这些政论文，主要阐述儒家经义，文章的中心是说“尧舜禹汤为天下后世法；桀纣幽厉为天下后世戒”，明确地点明了他致君尧舜，改革朝廷残暴统治的政治观点。至大元年(1308)，他升任监察御史。御史台是掌管国家风宪的监察机构，对于整肃吏治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亦

莫危于风宪”。它入则“与天子争是非”，出则“与大臣辨可否”，而一言一行，不仅关系到别人的生死荣辱，也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成败安危，确实是“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的险位。张养浩在《上董中丞书》中，曾奉劝董中丞要大胆打击歪风邪气，振作台纲，整肃风纪。他自己这样说，也这样去做。他针对武宗朝“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等腐败状况，不顾个人安危，于至大三年向元武宗上《时政书》，直斥朝政十大弊端，要求进行改革，并乞罢尚书省。他的上疏，触怒了皇帝和当权大臣，被借故罢了官。但他光明磊落，始终没有屈服。这种不避险难，直言敢谏，为国为民的品格，为后来的临宪者所敬佩，其事迹广为传诵。

至大四年(1311)，武宗去世，仁宗即位。仁宗在东宫时，就很佩服张养浩的文才和为人，因而他很快又被起用，曾先后被任为右司都事、翰林直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最后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进入元王朝的决策机构，这是他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与元明善、吴澄等，恢复和主持了元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士科考，选拔了张起岩、许有壬、黄潜、欧阳玄等一代人材，对元朝的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吴越，风于餐，雨于宿”（《静斋记》），奔波王事，为延祐之治立下了功劳。这期间，他还写下了《庙堂忠告》，要求庙堂之臣要“廉以律身，忠以事上”，要能“用贤”、“重民”、“远虑”、

“应变”，这些都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延祐七年(1320)，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张养浩失去了政治靠山，元英宗又“好以刚锐神武御下”，群臣悖旨，动辄被杀。张养浩所上《谏灯山疏》，虽被英宗勉强接受，受到奖励，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继续在朝为官的风险，改而采取“触几先见，退身于未辱之前”(《三事忠告》)的态度，便于至治元年(1321)以父老归养为由，辞官归里。在张养浩归卧云庄的七、八年间，朝廷曾七次遣使，征聘他出山，但因在短时间内，换了三、四个皇帝，皇权斗争剧烈，政局不稳，他看到无法实现“致君泽民”的抱负，因而始终没有赴任。在这七八年间，他优游于故乡山水泉林之上，陶醉于诗酒田园之中，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云庄乐府》的曲作，绝大部分写于这几年间。他的《归田类稿》也编于此时期。张养浩在《送元复初序》中说：“用则经纶天下不以为夸，否则著述山林不以为歉。经纶所以行道，著述所以传道，其升沉显晦虽若不同，揆诸事业则埒也”，这里作者明确地阐明了他归隐的态度和动机。也可以看到他晚年的思想虽消沉而不消极。

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御史台中丞。他想到“民之流亡，如己流亡”，虽年已六十，却“一命即驾”，“登车就道”。在陕西赈灾中，他罄思竭力，“出币发粟，全活生灵，不知纪极”。终因积劳成疾，到官四月而逝。“秦民闻信，疾首痛哭”，为立祠于曲江池畔，以示纪念。苏天爵在《七聘堂记》中称赞张养浩说：

“执法牧民为贤令尹，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台则号能臣”。这些评价虽以封建标准而论，观其为国为民之实，实则不为过誉。

二

张养浩的文学创作目的十分明确，他在《归田类稿自序》里说，他没有“班古人、甲当世、图不朽”之奢望，而是“因事寓怀及应酬征索”，基于现实所用，有所感而发的。他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同代人的赞誉，引起后代人的珍视，并被收入《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之中，虽然散失了不少，尚存六百多篇。他的诗、文、曲、赋，多是“依义理而切于日用之实”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作者一生的思想发展变化，乃至心理状态的流程，内容广泛充实，政治性和思想性都比较强烈。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抒写了自己勤政爱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理想，揭露了元朝政治的黑暗与腐朽。

张养浩虽自幼生活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但他所受的仍是汉族传统的文化教育。因此向往“三代”的清明政治，希望能出现“尧年舜日尽民欢”的安乐时代。所以，在他早年的诗歌创作中，就流露出革新政治，恢复“太古淳风”的理想。这虽然是封建的复古思想，但对元廷黑暗政治却是有力的冲击。他主张为官正直清廉，勤政爱民，反对“吉网

罗钳”，伤害同僚，坑害百姓。在《初拜堂邑县尹》诗中说“一县安危任不轻，初闻恩命喜愁并。徒劳人尔岂吾意，何以报之惟此诚。操刀岂容伤美锦，循墙谁敢望高名。前贤为尹规模在，他日须期与抗衡。”这种严以律己，又严以戒人的品德，在不少诗里都有体现。他的《赠刘仲宪》和《哭张澹庵平章》等诗，赞美了刘仲宪和张珪以身“许国”，直言敢谏的优秀品格；在《葛推官平反诗序》里，表彰了葛云卿为民昭雪冤案的动人事迹；而在《送王克诚序》中，指出了“薄于己而厚于民，约于家而丰于公室，举天下利欲不能动其心”的品质，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都表明了他勤政爱民，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与理想。

张养浩勤政爱民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统治集团的贪婪和横暴的揭露和反抗上。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政治上仍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其统治方法比之封建制要简单粗暴和愚昧落后得多，而在专制的官场中暴露得更加明显。如当权统治者任意赏赐“功臣”、“皇族”、“亲信”，随意杀戮臣仆、百姓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作者对这些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在《西台上王者无私疏》、《时政书》等作品里，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种机械地专制统治，给钻营投机者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利用阿谀逢迎，拍马吹牛的手段，媚好上级，往往能青云直上。作者在《鹦鹉赋》里，借鹦鹉的自白，暴露了贪官污吏害人虐物的罪行和不知羞耻的嘴脸。它说：“造物者赋我如是之性，胡能废而不庸？”这不正是官场中投机家们

浮沉的自供状吗！在《赠刘仲宪》诗里，作者更为形象地说道：“君不见，东家求官交近侍，西家豪富相征逐”，更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官僚士绅争名夺利的丑态。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者常借用“咏史”、“怀古”诗等形式，讽刺揭露元朝统治集团专横跋扈，不施礼教的暴行。在《武帝》二首里，便是以历史来比喻现实。其中“内兴土木外禽荒，北伐东征事扰攘”的诗句，与其说是对汉武帝征伐的讽刺，不如说是对元朝屡次征讨四方的揭露更为贴切。在《登徐州项王戏马台》诗中，作者指责项羽抛弃“鸿门老叟”范增的罪过，实际是对元廷压抑文人，废止科举，摧残人材的愚昧政策的谴责。在《福州》、《游香山》诸诗中，作者凭吊“荔子种成唐室祸，芦花飘满越王宫”、“宝刹千间穷土木，残碑一片失辽金”的历史遗迹，实际是警告元朝统治集团不要重蹈唐明皇生活腐化导致唐王朝衰败的覆辙；汲取辽金灭亡的历史教训，用心可谓良苦。

张养浩对尔虞吾诈，腐败黑暗的官场，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朱履曲〕（警世）、〔庆东原〕（海来阔风波内）、〔雁儿落兼得胜令〕（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等曲作里，把黑暗腐败的官场比作“醢鸡瓮”、“功名火坑”；把自己的官场生活比成“做梦”；把退出官场，归隐田园看作是“跳出天网”。凡此种，可以看到作者对贪官污吏、黑暗官场的憎恶态度。

第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灾难，寄寓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张养浩自幼生活在农

村，在堂邑做过亲民之官，晚年归隐田园，又去陕西亲自赈济过早灾，对农民的生活有着较深的了解，因而这方面的作品写得都很亲切、感人、真实。首先是作者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热爱，从而反映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状况。他在《我爱云庄好》、《晨起》、《拟四季归田乐》、《饮田家醉归》等诗中，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农村的生产画面、劳动场景、以及农民的劳苦生活。如“农粪初开地，童梁已断桥”、“田头父老过，击壤今岁丰”、“有酒略贵贱，相请辄同娱”等，表现了作者与农民的亲切感情。其次，由于作者热爱农民，因而对他们所遭受的疾苦和灾难深表关怀和同情。在《悯农》诗里，反映了“征负”逼得农民家徒四壁，妻离子散，饥肠辘辘的社会现实；在《哀流民操》和《长安孝子贾海诗》等篇中，描写了陕西大旱，饥民相食，“十里路埋千家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甚至卖儿鬻女，杀子而食，血泪斑斑的惨景；在《驿卒佟锁住传》里，还记述了蒙古奸民劫掠儿童，并加以转卖使之沦为牧羊奴的惨状。这些作品充满了作者对人民疾苦的有关切同情，也揭示了造成人民疾苦的各种社会原因。其中虽有天灾，但更多的是人祸。因而作品反映的社会本质更为深刻，而思想意义更为重大。再次，作者对人民灾难不仅是同情，还竭力尽诚地拯救人民于水火，和农民同欢悦共忧戚，不少诗歌记述这方面的内容。他的《行水灾郊外》、《雨后行县》诸诗，〔南吕一枝花〕《咏喜雨》、〔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等作品中，都有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当大旱不

雨,“万象欲焦枯”之时,他心急如焚,焦虑异常,竭诚救灾祈雨,真乃是一心一意为民竭力;当喜降大雨,“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之时,他又欢乐万分,与农民一起跳舞欢歌。“和余,欢喜得无是处”,生动地反映了他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崇高思想。

第三、描绘了祖国与家乡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张养浩宦迹所至,南到苏杭浙闽,西入关陕甘陇,北出兴和、上都,中经郑洛徐杨,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描绘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凭吊古迹的笔墨。这些诗篇里,充满了他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对祖国优秀文化遗迹的仰慕,对创造历史的人民和英雄人物的歌颂。在《福州》、《泉州》、〔水仙子〕《咏江南》等诗里,对南国风光浓墨重彩,豪情激荡的摹绘,使人读后羡慕异常。而对北国风光,又是淡彩寒色,绘画得别具风采。作者在《上都道中》、《中都道中》、《南口道中》诸篇中,把塞北草原的奇丽风光,描绘得使人想象不已。

作者对故乡的湖光山色,林泉草木,充满无限的爱,从内心里流出无数赞美的诗章。他曾说:“吾郡山水窟,奇胜闻未尝”(《登汇波楼》),因而他对家乡的水光山色,大笔挥洒,描写奇异。那“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常吼半空雷”(《趵突泉》)的诗句,对趵突泉涌浪堆雪的描写绘形绘声;那“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登泰山》)的诗句,描绘出泰山高耸入云的雄伟气势和日出大海的绚烂景象;那“翠绕轩窗山陆续,玉萦城郭水周遭”(《登历下亭》)的诗句,再

现了泉城济南山环水绕，大明湖映红照翠胜似江南的自然风光，这如画如图的山水诗篇中，包含着作者无限热爱家乡的深情厚意。所以，周永年称赞他“于环城之溪光山色，刻划清新，为诸家所未及”（《归田类稿重刊序》）。在元代文坛上，他的诗曲，对自然山水的描绘，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占主要部分；但也有的篇章常常同消极归隐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归隐并不是全完消极避世，而是消沉避祸，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他在《云庄记》里曾说：“人之处世，其去就无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处也，非苟洁身，要之各适于义为无歉。”因而，他的入世为道义做官，他的出世又为道义而创作，所以他的山水之作，对人们是有教化和启发作用的，这是他描摹山水比同时代啸傲山水的作家高过一筹的地方。

当然，张养浩的作品也含有封建糟粕。比如有些作品宣扬了“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也有的宣扬了“天命”、“神灵”等唯心主义宿命论；还有的宣扬了“独善其身”中庸之道；甚至有寄情诗酒的消极思想，这些与作者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是分不开的，应客观地加以分析批判。

三

张养浩的文学作品不但思想内容充实，而且艺术成就较高。周永年说他“各体之文，往往神施鬼设，自辟门庭”

《归田类稿重刊序》），这个评价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它却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养浩各类作品的艺术成就确实有新的造诣。

张养浩是元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成就不一定在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之下。其诗风格清新，体裁多样，完全可以自成一家，独立于元代诗人之林，因此不论《元诗选》，还是《元诗别裁》集，无不收入他的作品。清代顾嗣立说他的诗“其风致潇洒在元和长庆间”（《元诗选》），他自己也说有的诗是“效韩文公体”。由此可见，他的诗歌创作，是以唐诗为范例。当然，张养浩学习唐诗，并非单纯学习元白诗歌的形式，也不是摹拟元和作家的作品，主要是从精神上继承和发扬。第一，张养浩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诗不论古体、近体，都具有新乐府缘事而发，直抒胸臆，题材广泛，诗风质朴的特点。比如《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以五言为主，杂以四言，节奏起伏跌宕，表现了诗人面对流民疾苦焦虑不安的心情。这种灵活多变的语言特色，明显地吸收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一些长处。